

全球史译丛

A NATION AMONG NATIONS

万国 一邦

[美] 托马斯·本德——著
孙琇——译

THOMAS BE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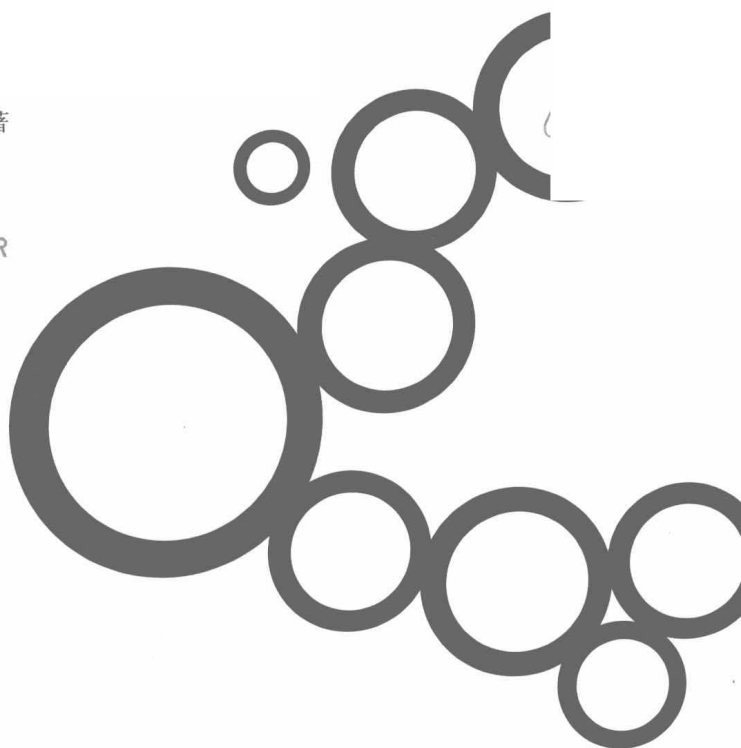
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中信出版集团

[美] 托马斯·本德——著
孙琇——译

THOMAS BENDER



万国 一邦

全球史译丛

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 (美) 托马斯·本德著；孙琇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ISBN 978-7-5086-8610-3

I. ①万… II. ①托… ②孙… III. ①美国—历史—
研究 IV. ①K7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029502 号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Copyright © 2006 by Thomas Bend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著 者：[美] 托马斯·本德
译 者：孙 琇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30.75 字 数：544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293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8610-3	
定 价：7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I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全球史译丛》

主编

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 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 荣 岳秀坤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也称“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之后演变成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 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 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 2000 年全美已有 59% 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 5 年后又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 全国 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 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 2005 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 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 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 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 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 2001 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 在 2002 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 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 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 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 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 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

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

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相关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 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

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

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

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致大卫和索菲亚

中文版序言

《万国一邦》的写作缘起始自 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我同学者、记者以及商界领袖的对谈，我们就经济、移民、大众文化（从服饰到音乐）的全球化展开了讨论。当听到一种宣称，说某样事物是一种全然崭新的现象时，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总有一种态势要做出回应。我们的冲动就是要检验这类宣称。我们会提出一个历史问题：那真的就是全然崭新的吗？也许它远比我们所认定的更具渊源。

将这种立场作为一种质疑，我走访了美国几大主要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以及一个规模更小的私人基金会格拉迪斯·克里布尔·德尔马斯基金会（The Gladys Krieble Delmas Foundation），它们都曾以资助重要的研究计划著称。让我惊喜的是，我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我的这一观点极为重要，并为这一研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助。根据一项提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为期四周的夏季会议，就如下的历史问题做出发表：18 到 20 世纪各国间的全球联系及其相似性。

与会者来自五湖四海，各大洲皆有分布。每次的夏季会议都会邀请不同的与会者，尽管为了保持对话的延续性，我们也会邀请四到五位先前会议的参加者。这些会议在纽约大学名下景色宜人的拉比埃特拉避暑山庄（Villa La Pietra）举办。这一避暑山庄正是供纽约大学的学人海外游学、举办会议的好去处，它也有理由让我们得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化中心漫步思考。经过 4 年的会议，有 80 位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我们讨论的结果通过两种出版物向公众展示：一份简洁的手册

《拉比埃特拉报告》(the La Pietra Report, 2000年),向课程大纲的修订和专业研究都提出了以资借鉴的各种理念;一本由16位与会者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既探讨了思考民族国家史的转向带来的深远影响,也为这一研究路径将会呈现何种风貌提供了一些范例。由我编辑的这本书在《报告》发表后的两年出版,定名《在全球化时代反思美国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这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斩获颇丰的学习经历,通过与会者发来的信函和电邮,我也知道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同样如此。我先前的研究和写作一直聚焦于合众国史,特别关注在城市——特别是纽约城——背景下的知识分子。^[1]我曾给朋友打趣说:写完这么多纽约城的历史著,下一步我要放眼全球了!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动机。作为一种学术门类的历史学,在19世纪的德国发展起来时,它的组建围绕民族-国家展开,是国家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打开那个闭锁的匣子,将其置于一重更宽广的世界背景之下,也许会有助于公民和政客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只是列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国家都在共享着这个世界。它们不仅通过贸易和移民活动被搅在一起,也日益被技术和文化所连接,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同样也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它们各自采取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别样路径。

这一观点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我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概念深表不安。这一概念出现在冷战早期,凭此(人们)把合众国放在了更宏大的各国共同史之外。当然,合众国是不同于其他各国的,中国也同样如此。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是例外的,都不能宣称置身于历史之外。

[1] 《走向城市愿景》(Toward an Urban Vision, 1975),《纽约智识:纽约城知识分子生活史,从1750年到我们当下时代的发端》(New York Intellect: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New York City, from 1750 to the Beginning of Our Own Time, 1987),《未完成的城市:纽约和大都会观念》(The Unfinished City: New York and the Metropolitan Idea, 2002)。

冷战时代，那些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很典型地以一篇清教徒布道（lay sermon）为参照，那场布道的发布正值 1630 年清教徒定居者刚刚抵达马萨诸塞湾，他们希望能够在波士顿安营扎寨。他们的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曾说：“我们将会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目必将仰慕我们。”对例外论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这批人，从“美国研究”（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发明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专家，到作为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无不回首以这些清教徒为参照并征引那个特殊的语句。当里根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一引文的出现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奠基时刻时，他们却并没有遵循其完整的陈述。在这个常被引用的只言片语之后，温斯罗普还继续写了下去。上帝和世界将会成为我们的法官：“如果我们不能依照上帝的旨意正确地在这件我们已经担当的工作上行事为人，进而引发他从我们身上收回他所馈赠的帮助，我们将会铸就一个为人议论的故事，成为全世界的笑柄。”^[1]随着它在冷战中的发展，例外论否定了世界其他地区对合众国的评判。但在事实上看，美国人只是诸多民族中的一种，而非什么特立独行的例外，跟所有民族一样，我们最终都要对人类整体担负责任。

伴随着一种优越论的假设，例外论将美国史放置在所有的他国史之外。例外论的假设缭绕心头，我扪心自问：美国史中的哪些关键时刻只是一种例外呢？还是更宽广的、更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呢？在本书中，我关注了美国史和那些发生在其他各洲的特殊的大事件：欧洲强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定居活动，特别是作为革命之后果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创制，国家建构的影响以及内战或其他对 19 世纪新奠基之民族-国家构成挑战的事件，当然最后也包含对帝国的讨论。我认为我的“发现”是有效合理的，至少有三大洲经历了相似的事件。本书表明，虽然各大洲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依然存在一种共

[1]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载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和托马斯·H·哈钦森（Thomas H. Hutchinson）合编《清教徒》（*the Puritans*）（两卷本，纽约：哈泼斯 & 罗氏出版社，1963 年），第一卷，199 页。